

汉英象似性研究的不足与出路

侯广旭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在目前的语言象似性研究中,学者们多从形或结构方面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而很少重视分析单纯符号尤其是音义象似性,在音义象似性的描述上也很少有人注意运用语音学知识。象似性研究中的这一不足,应通过从语音学角度对汉英单纯词音义上的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的探究来弥补,这样可以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与认识语言进化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关系。

[关键词]单纯词;音义象似性;语音学;任意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3)02-0097-08

一、引言

象似性是近二十年来国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在国外受到了从事象似性研究的认知语言学家与功能语言学家的质疑与批评。也许是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任意性原则”也有比较激烈的争论。1988年许国璋就对索绪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1],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更是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目前国内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以王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象似性学说比任意性学说更合理;郭聿楷、王德春、朱永生、鲁岑等学者坚持认为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功能主义的许多研究过于牵强;第三种观点认为任意性和象似性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对于语言符号系统的产生和运作来说,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2]。从对“任意性原则”的强调到对“象似性原则”的关注是语言范式由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主要是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转变的结果^[3]。

目前,在这股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与象似性研究热中,有些学者从王寅所称的“形或结构上”即文字、复合词(合成词、派生词等)的构成、句法甚至语篇层次上论述了语言的象似性^[4-6],而没有重视对单纯符号尤其是抛开文字拼写的口头语言的音义联系(也就是索绪尔任意性原则所基于的音义联系)的探索,在象似性的描述上也没有注意语音学知识的运用。本文拟从语音学角度对汉英单纯词音义上的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等进行探究,以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以及语言进化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关系。

二、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与象似性学说的首要证据

语言学研究者往往有两个“遗憾”和一个“常识”。其中一个“遗憾”是人类语言无化石,即没有古人类语言的录音或化石;另一个“遗憾”是哪怕是现在找到的仍为所谓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部落

[收稿日期]2012-09-1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KYT201006)

[作者简介]侯广旭(195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

人,其语言表义与结构也是发达的,而不是原始的语言。一个“常识”就是“优先原则”,即语言学研究要遵循语言的语音(口头)形式优先原则。道理很简单,语言首先是有声的。文字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有据可考的仅仅是近几千年,而且,根据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 2003年的统计,世界上6809种语言中仅2261种有文字^{[7]8}。有些语言的文字历史不过百余年,如阿留申语。因此,用音义象似性来研究语言的象似性,更能揭示人类漫长的生物与文化(包括语言)进化过程中“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的人类认知与语言进化之间紧密的联系。随着传递信息需要的增加,人类发音表义的能力也在增强,或摹声(感叹示情或模拟动物声、风雨雷电声),或摹貌(模拟事物的状貌),或摹态(模拟事物的动作姿态)等。人类利用空间、时间、因果、表里、虚实等思维联系来促使音义之间形成原始联系,这些联系与日俱增,通过辐射、转类或隐喻等派生出越来越丰富的音义联系。音义互联初始,人类利用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使自己的身心与外部世界互动,有意识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规律来描摹外界的意义。像人类在生存竞争中不断地选择适应性基因一样,以音表义的寻求过程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为了求生、求食、求偶等目的,人类交流信息尤其是爱恨、好恶、吉凶、亲疏、利害、有无、取舍、开关、上下、来去等大是大非乃至生死攸关的信息时,不得不要求准确与高效,否则连人的自身都会面临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这样才使我们拥有了利于人类习得与交际、高效且适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语言。

文字出现后,人类一步步地进入了语言与认知能力高度发展的时代。音义象似性比文字象似性更原始,因而也更具说服力。

三、汉英象似性研究的不足

(一) 偏重单纯词的形式象似性研究

王艾录、司富珍研究语言理据较多,他们虽然认同音义象似性,但其研究对象和所举例子基本围绕复合词理据、句法理据展开^[4-5]。

国内象似性研究热时期的有些著述读起来就像是传统词汇学教程中的构词法,缺乏新鲜感。从语音学角度对象似性探讨得不够,可能是象似性支持者没能说服其反对者的原因之一。对于有些人拿“orbit”中的“o”与圆相似以及拿“桌”“椅”都有木字偏旁等来证明象似性,朱永生认为他们只停留在书写符号之间的某种联系,不能说明这些符号与所指对象的任何必然联系。他说:“有些学者根据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复合词和派生词,而且这些词在英语中占所有单词总数的90%以上这一事实,得出了象似性大于任意性的结论。……现在的事实是,对Saussure进行批评的人基本上都从书写系统而不是从语音系统来考察任意性和象似性。在我们看来,虽然复合词和派生词的构成具有一定的理据,但所有词的语音与它们所指代的客体之间还是没有太多理据可言。”^[8]

朱永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音义象似性上来证明语言的象似性本质。其实,从朱文中的例子本身我们就可以进行音义象似性上的深究。英语里“o”开头的词“orbit”、“oval”、“ovum”等与“圆”义有关的词,都以圆唇动作的元音开头,后来先民很聪明地用“o”的写法代表各种圆唇。“桌”的发音包括齿龈擦音和后高元音,发音位置在口腔内高处,而“桌”高于“几”,同音的“卓”也有高的意思。“凳”来源于“登”(登高),它和“升”、“蒸”、“腾”、“乘”等同样都用声音和口形模拟升高的意思。“椅”的发音包含前高元音,舌尖与上齿距离极近,几乎倚在牙上。“椅”这种有靠背的凳子,人们坐在上面可以靠一靠。

(二) 单纯词音义的宏观象似性研究的不足

郭鸿认同索绪尔观点,认为“ten”、“sheep”、“apple”等单词具有绝对的任意性,但其合成形式“fifteen”、“shepherd”、“apple-tree”却有相对象似性,因为其结构是简单形式的合成^[9]。

笔者认为郭鸿把象似性存在问题归为互相排斥的有否判断,忽略了象似性应有个“度数”的区别。无数例证表明,人类在以音表义的过程中,始终尽量巧妙地选择具有某种程度象似性的符号。

首先,拟声词、感叹词的象似性程度最高,如各种语言中彼此最相似的动物叫声拟声词,猫叫拟声词和布谷鸟叫拟声词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由拟声联想而生的词,其象似性也较高。如汉语“火”和英语“fire”可能均来自描摹着火的声态。“炸”、“炒”与“煮”、“炖”,英语“fry”与“stew”,都略微模拟了不同烹饪法做菜时的声音。

最后,按数量、距离、顺序、姿态等特征模拟客观事物的词象似性较高。这类含一定程度象似性的词数量最多。“吸”、“抽”、“吐”、“喷”等都是典型例证。模拟形状的“丸”包含圆唇通音,后来这个音又表示“玩”(“玩”往往是像球一样规则平等、各方机会均等的游戏)、“完”(圆画完全意味结束)等相关的意义。含圆唇通音的“弯”、“碗”、“湾”、“蜿”均属一类。人类为何在“圆”、“球”、“卷”、“滚”、“圈”、“环”、“弧”、“珠”、“柱”、“管”、“罐”等词中都加入了圆唇的后高元音?英语为何用圆唇音表示圆或环(“round”、“loop”等),用展唇音表示“扁”(flat),而不是相反?人们应诺时的用词“行”、“好”、“对”、“可”等,唇形开放,气流通畅,表情轻松,而表否定、拒绝时的词“不”、“勿”、“否”、“莫”、“无”等,唇形相对闭合,气流受阻,表情是气冲冲的样子。“酸”、“苦”、“辛”、“咸”等,其发音时的口形、音长以及连带的面目表情,都模拟了人感受相应事物时的反应。对“苦”最敏感是舌根部,用软腭塞音加后高元音,且用上声,表厚重感觉;而舌尖对“甜”最敏感,故先民用齿龈塞音加前元音与齿龈鼻音和平声表轻快感觉。英语“sweet”、“sour”、“salt”也用了口腔前部的元音和辅音,突出舌尖感觉。“卡”和“jam”分别用软腭塞音和后龈擦音使舌根紧张,有受阻感。

以上拟声、感叹以及由此联想派生出的单纯词,加上具体模拟事物数量、距离、顺序、姿态等派生出的单纯词,其中的象似性可称为微观象似性。

还有一类是宏观象似词。本族词(native word)一般是各自语言生发较早,表述人类行走坐卧、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或生产活动的日用必需词,因此一般语音简短,单音节居多。先民造词,由短及长,由单到多,总体上看,这就具有宏观的象似性,如郭鸿所引用的“sheep”^[9]、德语的“Schaf”和荷兰语的“schaa”,应该说都具有宏观象似性。郭鸿认为“fifteen”有相对象似性,而“ten”没有^[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们用单音节词表示一位数,用双音节词表示两位数,在各种语言中情况大略相同。先民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某一音义联系,那么该原因应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理据或象似性。学者们应该如胡适所说,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三) 单纯词音义的微观象似性研究的不足

两千多年来,中西语言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语言的音义没有必然联系,语言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常举的例子是“把女人叫做男人、男人叫做女人都可以,把天叫做地、地叫做天也行,只要约定俗成就行”^[10]。

刘应德认为,英语为何用“come”表示“来”的意思,汉语为何用“lai”是没有道理可说的,就是拟声词,也具有极低的象似程度,不足以否定音义的任意性。他举例说,中国有多少种狗、多少条狗这个事实是难以统计的,但是汉语却只用“汪汪”这一声音符号来指代狗的叫声,这与现实中如此多物理意义上的狗叫声有多大的象似呢?他接着说,英国美国有多少种狗、多少条狗也是一个难以统计的事实,然而他们却只用一个“bark”这一声音符号来指代狗的叫声。不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声音符号来指代这一概念的原因是不可论证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与这个概念有联系或者与物理意义上的狗叫声音有着极大的象似性^[11]。

以上观点普遍反映出对单纯词微观音义象似性的研究不足,事实上,以上论述援引的例证都包含象似性理据。首先我们看上述例子“男”和“女”。很明显,发“男”的音先是齿龈鼻音和前中高元音,再回到齿龈鼻音,共鸣响亮,体现阳刚之气;对比之下,“女”的音口形小,从齿龈鼻音开始,圆唇始终较小,共鸣音相对小,带有温柔的感觉。英语里表阳性的词,如“man”、“masculine”、“male”等,元音低,口形大;表阴性的词,如“woman”、“feminine”、“female”等,包含口形较小的前元音或后高元音。同理,“major”、“main”、“cock”等表示大或刚阳,而“mini-”、“little”、“bit”、“hen”等表示小或阴柔。

再看“天”和“地”的例子。古人把头上的叫“天”，齿龈塞音加前高和前中高元音再加鼻音，元音持续时间长，口腔肌肉相对紧张，共鸣从口腔上部延伸到鼻腔，嘴巴是开放的，这正是看天时的口部动作。古人边说话边看天时，上下颌应该是张开的，英语的“sky”，上下颌也是张开的。古人为什么没把头上的叫“地”，而把头下面的叫“地”？“地”的元音持续时间短，口腔肌肉松弛，嘴巴不是很开放，因为看地，不需要肌肉紧张与大张嘴。“高”的口形也大，“低”的口形也同样较小。“低”、“底”、“氍”、“诋”、“滴”、“递”、“弟”、“娣”等含有同样的音素，有“低、下、向下或次第”的意思。所以，古人完全可以把“天”、“地”两个音义对调的说法难以服人。其实英语里“d”的音常用来指低或下面的东西、状态、方位，如“dig”、“under”、“down”。表示“地”的词，如“land”、“ground”也都有d的齿龈塞音。再进一步说，汉语的声调也被人本能地用来区别意义。“天”用了两个元音，音绵长，模拟天的辽阔广大，“地”用了一个短前高元音，短促，给人感觉天大地小、天高地低、天长地短。汉语里高的、轻的、空的事物常用平声，重的、浊的多用仄声（“平”用平声，“仄”用仄声，本身就具有象似性）。如“天”、“飞”、“空”、“清”、“轻”、“飘”、“浮”、“云”、“升”用平声，而“地”、“重”、“破”、“堕”、“坠”、“降”用仄声。甚至就连下落的東西轻重不一样，人们也凭直觉照此加以区别地对待。如“草木凋零，邪乃伤肝”（《素问·五常政大论》），写轻的花草用平声“凋零”，而“星有坠落，乃为石矣”（《颜氏家训·归心》），写重的星辰用坠落。“金属铸造”与“陶土加工”在语料库里各自搭配频率高，也是因为金属重于土，所以“铸造”都是仄声，“陶”和“加工”都是平声。总之，让古人闭嘴说“天”，张嘴说“地”，不太符合生物以最省力、最高效的方式适应自然的进化规律。当这种现象多见且在多种语言中都有发生的时候，用“巧合”而一笔带过显失公允。

刘应德所举的“come”和“来”的例子^[11]里面也含有音义象似性。“来”用齿龈边音加合口双元音，模拟邀请的样子，这个语义肯定不会用发“去”的动作，因为“去”口形小，气流有阻塞，有一股气吹出去的样子。英语的“come”和“go”，前者结束于双唇紧闭的鼻音，动作内收，示意外界事物向说话者方向运动，而后者止于由中元音滑到后高元音，双唇开圆，舌位由低抬高，有向外驱逐、释放的意味。由此可见，“来”和“come”与其反义词“去”和“go”是不太好对调的。另外，笔者认为刘应德关于中英狗叫的说法有点不妥，因为汉语的狗叫除了“汪汪”，还有“猎猎”等，英语的狗叫除了“bark”，还有“bow”、“wow”等，更不用说各自方言里还有多少种变体。我们谈语言符号象似性的前提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是媒介，它只能提示客观事物在心理上形成的间接形象与联想（所指），因此，不必强求拟声语言符号必须达到与客观事物的发音录音一样的吻合程度。各民族母语使用者可能感觉自己本民族拟声词更酷似客观事物的声音。我们称“红糖”而英美人称“brown sugar”，我们称“红茶”而英美人称“black tea”，各自从自己的观察视角更觉得符合这两种食物的客观颜色，其道理是一样的。

四、汉英象似性研究的出路

功能语言学与符号学认为，语言的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时间、空间、等级、认知等）象似性、标记象似性等，在语音、文字、语法、语用等层面都有所体现^[12]。汉英象似性研究的出路在于不能停留于或满足于对单纯词形义象似性（如汉语的象形、形声、会意、指事等理据和英语的合成、派生等构词法理据）的探讨，而应从语音学角度对汉英单纯词音义上的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模态象似性进行探究，以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特征以及认识语言进化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关系。

（一）单纯词音义的数量象似性

单纯词音义的数量象似性主要体现在用小口型、小（发音）动作、小音量等来表示趋向于小、弱、阴性的事物或意义。

“子”、“字”、“孳”、“籽”、“孜”、“仔”、“芋”等都含有“子”，提示我们如何发音，有的字如“籽”偏

旁还有提示意义,这些都是理据,但是都是语言产生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形义理据。若继续分析这些具有相似音的词,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都含有音义的数量象似性。古人用小口型、小(发音)动作、小音量的齿龈擦音加前高元音来模拟东西一点一点冒出来或不断敲击的声音,后来又用这个音来表达“持续不断”、“滋生多个”、“生发幼小”、“(禾苗)杂生”等彼此联系的含义。子女、方块字^①、植物的籽粒等事物都是从古到今、持续不断地繁衍生殖的客观事物。

“溪”、“河”、“江”三字,就形义理据来说都含“水”,右边都提示了发音。就更为古老的音义理据而论,我们可进一步推测,人们很可能在用这三个音高、音响、口形依次渐大的音在模拟水量、流势、所处地貌不同的水体发出的声响。

“昏”,包含声门擦音、后高元音和齿龈鼻音,口形小,共鸣在口腔后及鼻腔,而“光”、“亮”、“朗”、“浪”(有水清澈明亮义)等反义词,均口形大或用了前元音。所以,“昏”、“混”、“浑”等相似的发音都指“光线不足”或“不清楚”,后来的“婚”也是出于这个联想(古代的婚礼一般是在黄昏举行的)。“沌”、“钝”等都有混沌义,也为同理。

(二) 单纯词音义的距离(空间)象似性

单纯词音义的距离(空间)象似性,就是利用发音动作、舌位高度、语音长度等来模拟客观事物的距离、空间上的意义差别或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意义。我们分析“飞”、“飘”等例子时,从形声或象形理据上证明象似性不如从音义象似性上说理更有力。“飞”、“飘”、“升”等动作趋向于用较高的舌位与飘逸的音调,而“坐”、“落”、“降”等动作趋向于用较低的舌位与下降或沉重的音调。英语里的“fly”、“float”和“drop”的音调道理也是一样的。至于一般疑问句普遍用升调,肯定句普遍用降调,英语不规则变化动词的现在式的发音舌位高于其过去式的发音舌位(如“see”和“saw”,“teach”和“taught”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是身体空间距离体验与语言的认知联想的结果。也就是说,疑问语调与身体重心距离地面高时的不稳定性形成联想,肯定语调与身体重心低时的稳定性形成联想,发音舌位高与口型小与“现在”形成空间距离联想,发音舌位低与口型大与“过去”形成空间距离联想。

(三) 单纯词音义的顺序象似性

单纯词音义的顺序象似性,是指发音动作或音响顺序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状态或音响顺序。物体的运动多数不是瞬间爆炸发生的,一般经历“启动—高峰—收尾”的过程。英语单词的音节响度理论认为,英语音节响度一般由小及大到元音高峰,然后再由大及小而结束^[13],这也是对物体运动一般规律的模拟。汉语由声母开头到韵母结束的单纯词也具有类似特征。

人类以声传义,并非无序生发,它来自于人类先认知后模拟客观世界的以声传义的过程。如人类慢慢认知了水滴落某物表面的声音“滴沥”(tick)、“滴答”(tap)、“叮咚”(tinkle)的意义:第一个音节表示水先撞击表面散开,即“滴”(“ti-”或“ta-”)、“叮”(tin-);第二个音节表示不同材料的表面对水的容纳,即“沥”(-ck)、“答”(-p)、“咚”(-kle)。这样自然界与人的对话就开始了。同时,人也模仿着进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以声传义^[14]。

“扭”,从齿龈鼻音到前高元音再折返到后高元音,舌尖从前向后扭转;“twist”,舌尖从齿龈塞音开始,经过双唇通音、前高元音和齿龈擦音后,又回到齿龈塞音,舌尖在口腔前部扭转。这两个词都形象地模拟了“转、拧”的动作顺序。英语里带“sl-”(齿龈擦音与齿龈边音)的词常与“滑、滑动”有关,“slide”、“slip”、“slick”等前面的齿龈擦音加舌侧音示滑动开始,中间元音示滑动延续,后面辅音示滑动结束。“推”(push)、“砍”(chop)、“切”(cut)三个动作多含爆发力,其汉英语词均先含塞音或塞擦音表示动作发力开始,中间元音显示动作发力的效果,最后的塞音表动作突然结束,其中“push”的尾音是擦音,说明推的动作伴随的多是摩擦。而“抹”(smear)的动作一般不含爆发力,其汉英语词不但含塞音,且明显音长而婉转,模仿抹的动作顺序。

^①《说文解字》说:“字,乳也。”“字”的本义是“生孩子”。

处于腿部动作语义场的“stamp”、“stomp”、“tamp”、“tromp”、“tramp”、“step”和“tap”这组词,它们都由有力的齿龈塞音或加齿龈擦音开始,指示动作的开始。各词中[p]既表示动作结束,也表示一次性动作,它前面的双唇鼻辅音[m]表示发力时憋气的动作,继而显示该词所表达的动作力度更大,如“stamp”(跺脚)的力量肯定大于“step”(踏步)、“tamp”(夯实、踏实)的力量肯定大于“tap”(轻声走)。组中各词含[r]的词表示位置移动(在其他词中一般也是一样,如“race”、“run”、“rush”、“raid”、“rash”、“rob”、“robe”等),所以,“tamp”(夯实、踏实)动作在原地,“tramp”(步行、远足)动作在移动中发生。含[r]音的词一律处于动作起始的[s]或[st]音后面,说明先抬腿后迈步。总之,该组词完美地模拟了各个动作的过程顺序和动作要领^[14]。

(四) 单纯词音义的标记象似性

单纯词音义的标记象似性,指带区别性特征常表示额外意义的有标记项词的语音成分相较于其对应的常表示寻常意义的无标记项词的语音成分更为复杂。“wide”(宽)与“narrow”(窄)、“deep”(深)与“shallow”(浅)、“far”(远)与“near”(近)、“big”(大)与“small”(小)、“long”(长)与“short”(短)、“high”(高)与“low”(低)等,前者为无标记项,可代表宽窄、深浅等中性概念,也更加常用,因此,发音一般简单、口型大,汉语用平声多;而后者为有标记项,发音一般稍为复杂、口型小,汉语多用上声。有标记项词是为了满足人类认知复杂性增加的需求。

(五) 单纯词音义的模态象似性

音义互联初始,人类利用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使自己的身体的体验及姿态与外部世界互动,有意识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规律来描摹外界的意义,这当中也同样默守着数量、距离、空间、顺序等象似性原则^[14]。具体来说,单纯词音义的模态象似性就是用发音的音响、动作及表情等模拟客观事物与意义。

“闭”的形义理据就是会意,“从门,从才”。“才”意为“储备待用的物品”,“门”与“才”联合起来表示“关上原材料仓库门”。“闭”的派生义为“关门”。我们发现,“闭”音涉及双唇塞音和前高元音,其唇形几近紧绷、闭合的样子,对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神似的模拟。“比”(靠近,比邻)、“篦”(比梳子的齿要细密)、“算”(齿、孔、杆相对较密)、“逼(近)”等相似的音都用来表达相似的语义。相反,人们发“开”时则是开口的样子。英语里的“close”和“open”的音义联系,道理也是一样的。

“口”的形义理据是象形,但它也具有音义模态象似性。发“口”音时,从软腭塞音到口腔半开的中元音,再过渡到后高元音时,唇始终是圆的,动作从后到中再到后,展示了口腔的高深宽三维。英语里的“mouth”也是如此。“齿”是形声字,这是形义理据,但其中也有音义模态象似性:后龈处的塞擦音加前高元音的发音使上下颌靠近,口腔前部及唇肌肉紧张后的姿态正是向人展示着“齿”的样子。英语里的“tooth”、“teeth”也是同样道理。人们不用发“齿”音的动作展示“口”的状貌,也不用发“口”音的动作来展示“齿”的形状。发“口”音时,口腔软腭部分肌肉在用力,唇部肌肉内收,牙齿被唇包住。“唇”字里面有“口”,上面提示发音,这只是形义理据,但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唇”的发音正是在嘴唇处完成。英语里的“lip”包含了一个双唇塞音,展示唇部的样子。

我们再分析“润”、“滑”和“粗”、“糙”。前两字都有水,所以联想到“滑”,后两字都有米,没加工的米是粗糙的。这也只涉及历史不长的形义象似性。从语音学角度去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润”、“滑”辅音摩擦不明显,英语的“slippery”也是一样,而“粗”、“糙”以及英语“rough”、“coarse”都含有明显的擦音,这些都是在用语音模拟相应的事物状态。

其实,当我们列出一些有理据的字词时,音义理据的判断已经近在眼前了。解释“团结”,只说到两个并列词素“团”(把东西揉弄成圆球形)和“结”(用绳、线、皮条等绾成的疙瘩)合二为一,表达“聚拢成团,联合起来”的意思,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再去细查发“团”音时舌头做圆圈运动的一系列动作。英语“roll”的发音动作也相类似。

总之,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普遍存在,在语言的进化历史中更为原始,对揭示语言的象似性本质

更具证明力和说服力。

五、语言象似性研究的人文价值

语言的进化是由口头语言的单纯词音义联系开始的。毕克顿根据语言起源的壁龛建构理论,推想人类祖先在搜寻大型死动物过程中常使用象似语音符号来召集同伴。这个过程能造新词,或在新情景里使用旧词,进一步减弱词语与情景的剥离,这样久而久之,语言就起源了^[12]。迪肯认为,语言所独有的象征能力的发挥是人类大脑进化的关键因素。这种象征能力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因素^[12]。人类音义互联初始,即是语言进化初始。因此,要证明语言的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是任意性还是象似性,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最具说服力的是要验证单纯词音义象似性的存在。

语言的象似性、语言内部以及语言间的普遍规则控制性等语言的共同属性,使得各民族语言具有可学性、可教性、可译性与可记性。可以说,语言的象似性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化。为何不足五千年的爱琴文明(包括克里特文明以及后来出现的迈锡尼文明)被公认为是西方文明最初发源地,而比这更早的古埃及文明等却未获此殊荣?我们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解读,认为语言因素乃至语言的象似性本质在这里起到一定作用。爱琴文明中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在克里特岛孕育出了传说中的米诺斯文明。克里特岛地处东地中海中心位置,与欧洲(希腊)、小亚细亚以及非洲(埃及)仅隔一段极易航行的海上距离,因此米诺斯文明就与周边地区尤其是爱琴海沿岸地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再加上后来一千多年的向周边地区的文化辐射与殖民活动,这种联系使得整个爱琴海世界在文化方面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相似性和同源性^[15]。吟游诗人荷马谈到克里特岛时说,那里不同语言的种族都杂居在一起。民族混杂、多种文化(包括各种神话传说与神)相互交融的结果就产生了惊人的米诺斯文明。这一西方文明火种的点燃,就有语言之间同源性和语言内部象似性带来的语言易学性的催化作用。米诺斯文明出现一千多年后,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阿卡亚人建立了迈锡尼文明。公元前8世纪左右,来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字母的传入使得希腊人走出了因乙系线形文字失传而坠入黑暗的时代。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乃至印欧其他许多语种字母,都可追溯至象似性很强的腓尼基字母。印欧语言文字之间的同源性、象似性,再加上人类的对比、归类、概括、联想等高级认知智能的出现,使得爱琴文明中的希腊神话传说在相互混杂和演化中形成完美的形态与分明的谱系,而这种谱系成为西方文化宗教、哲学、文艺乃至科学的滥觞,并为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城邦社会在希腊的崛起奠定了文化交融的基础。从罗马杂乱无章的神灵世界朝着系统化方向的发展,到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之初的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颁布时罗马广场万民争睹的场面,各个民族的语言始终处于互相接触、彼此传递文化之中,帮助了印欧语系各民族在迁徙、暂时的破坏与建国过程中,结束野蛮、告别愚昧、打破闭塞,逐步迈向先进文化的文明时代。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的普及,到近现代西方文化中文艺复兴与三次宗教改革,从民族国家的兴起,到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贯穿西方文明的一条主线始终是多种文化相互间的不断冲击与交融。在此过程中,西方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同源性以及语言的强烈象似性、规则控制性与由此而来的可学性,使得各民族文化与思想更容易进行互相快捷频繁的交流、扬弃、融合、转型、协调。因此,语言学家一直在西方文明考察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西方文明进化中,语言的象似性功不可没。语言象似性在世界其他地区其他语系各民族的文明进化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语言象似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六、结语

目前国内关于象似性的讨论中,学者缺乏从语音学角度对有一定音义象似性联系的单纯词的深究,重视形义理据,忽视音义理据;讨论文字、形义、语法、语用理据者多,讨论音义理据者少;讨论中的视觉理据多,听觉理据少。这些不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根本属性,不利于我们研究语言的进化问题。

本文认为,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是语言象似性的首要证据,国内象似性研究的出路在于不能停留

于形义象似性的探讨,而要从语音学角度对汉英单纯词音义上的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等象似性进行探究,这对语言的本质认知以及人类文明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音义象似性研究起步早,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已有百年的历史,目前已经达到神经语言学水平^[13]。笔者认为,国内象似性研究今后应加强以汉语语料或汉英对比语料为主的语音学支持下的音义象似性的定性定量研究,既可以提升研究水平,同时也能更好地参与语言本质的学术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语言的音义象似性现象的发现越来越多,这使我们越来越感到语言这一地球上最高级生命的区别性属性,跟人的所有生命机制一样,在跟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环境的互动中,语种无论怎样繁多、南腔北调、孳乳相生、盘根错节,语言单位无论大小——音素、音位、词、词组、句、语篇——都按自然规律生成、运作,受自然规律系统控制^[12]。

参考文献:

- [1] 许国璋.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之一[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3): 2-10.
- [2] 张喆. 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J]. 外语学刊, 2007(1): 67-74.
- [3] 张凤, 高航.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重新考察[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3): 5-11.
- [4] 王艾录, 司富珍. 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5] 王艾录. 汉语理据词典[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2.
- [6] 王寅, 李弘. 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3): 1-6.
- [7] 陈新仁. 英语语言学实用教程[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8] 朱永生.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1): 2-7.
- [9] 郭鸿.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否成立[J]. 外语研究, 2001(1): 43-47.
- [10] 辜正坤. 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5(6): 87-95, 108.
- [11] 刘应德. 对语言符号象似程度的质疑[J]. 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8(6): 136-139.
- [12] Wikipedia. Iconicity[EB/OL]. [2012-08-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Iconicity>.
- [13]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M]. 四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4] 侯广旭. 基于语音学与语义学视角的汉英音义象似性研究[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2(3): 94-102.
- [15] 赵林. 西方文化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黄 燕]

Weakness and Recommendation in the Iconicity Stud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ono-morphemic Words

HOU Guang-xu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of iconicity of languages, most scholars preferred to deal with the iconicity from the angle of morphology or syntactic structure of written language at the expense of proper attention to mono-morphemic words or phono-semantic iconicity and their iconicity examples discussed were hardly described with phonetic subtlety. In this paper, the weak link in the previous iconicity studies was analyzed and commen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feasibility of phonetic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iconicity of phono-semantic words on the basis of principles of quantity, proximity, sequential order, etc. were highlighted.

Key Words: mono-morphemic word; phonetic-semantic iconicity; phonetics; arbitrariness